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国际秩序的重构

——再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路径

刘海霞

内容提要: 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既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又是形成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基础,不同的秩序观反过来又会促进或者阻碍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从深层次揭示了国际秩序变革和发展的动力,以此逻辑研究可知正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了国际秩序的不合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批判中要重建文化自觉,探索出超越现存的西方中心观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秩序。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国际秩序变革与重构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

一 国际秩序变革的动力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当代发展

国际秩序研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国际体系发展和变革的动力是什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这三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有诸多不同的解读。约瑟夫·奈就此指出,我们为了理解当今的世界,必须了解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关注建构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和文化上的变革。^①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特征,但是对无政府状态的成因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动力认识有所不同。约瑟夫·奈从人们对于自然状态的危害性的两种不同认识出发,梳理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分析方法的哲学源头,他认为

^①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现实主义源于把自然状态归纳为战争状态的霍布斯思想,而自由主义源于主张在无政府状态中发展相互关系和订立契约的洛克思想。^① 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体系内部成员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增长的差异最终导致体系内部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的根本变革。他指出,抢先阻止其损失或增加其收益,成为这些国家改变国际体系的动力。霸权战争在历史上一直是世界政治体系变革的基本机制。^②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未能充分关注跨国关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政府通过创制或接受某些活动的程序、原则或制度来调节和控制跨国关系、国家间关系。而且随着各国能力的发展,应允许贫弱国家分享地位,鼓励它们承担集体领导的责任。^③

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吸取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知识,考察领导人、民众以及文化改变偏好、产生认同和学会新的行为方式的过程。^④ 温特把结构理解为一种文化,不同时期的国际体系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结构,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敌人、对手、朋友——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国家会在相应的压力之下将这种角色内化于它们的身份和利益之中。^⑤ 温特把对国家互动过程中发生的事物的解释模式区分为理性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后者认为身份和利益是内生的,是可以变化的因素。而文化选择是一种进化机制,通过社会习得、模仿或其他类似的过程,推动集体身份的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四种“主变量”被温特视为集体身份形成的原因。^⑥ 温特还认为现行国际体系最具洛克文化特征,但康德文化特征正在加大。

上述三大理论固然为我们理解国际体系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比如对于如何解决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问题,这三大理论实际上并无良策。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际冲突主要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解决办法就是保持均势或者由某个霸权维持稳定。然而,此类方案不断遭到质疑。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均势是个邪恶的原则,因为它鼓励政治家像切奶酪那样,根据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不顾民众的意见,对国家进行瓜分。^⑦ 而霸权国家采取的军事同盟,则往往成为几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强权机制。再比如新自由主义提倡集体安全和国际制度,但是

①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6页。

②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07页。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47页。

④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11页。

⑤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⑥ 同上书,第53-410页。

⑦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88页。

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机制既可以被用来寻求排他的和地方的利益,也可以用来追求更加广泛的共同的目标。^①也即是说国际制度有可能被当做霸权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工具。而建构主义,虽然其通过引入文化因素和人的能动性概念,对现实主义视角下无政府状态的常态化存在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但其对国际体系发展的理想主义愿景却往往难以经受国际关系现实的考验。“即使在今天,即使我们承认洛克无政府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文化,国家之间仍然频繁地‘回落’到霍布斯文化状态。”^②

从方法论的视角看,某种理论的不足,或者源于其本身的逻辑链条存在漏洞,或者源于其背后的经验研究尚有缺失。三大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其理论体系固然已经相当成熟,但一个不可否认的问题是,为了解国际体系,三大理论对“国家”这一政治容器高度关注,而与国际体系的存续与变革同样密切相关的其他因素,如阶级、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分配等,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国际体系及其变革的规律,研究者们非常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动态的、发展的视角,关注国家内部和全球层面的社会变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国际秩序不平等的根源和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力。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思想,为我们理解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及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时代观”是对“时代”这一大的社会历史时期的总体认识和根本看法。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被视为对人类社会大时代的划分。列宁进一步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理论,并对大时代和小时代加以区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同1957年《莫斯科宣言》对时代的界定,即“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③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运动的角度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其要旨是揭示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罗伯特·考克斯把历史主义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主义的研究计划是去揭示以具体时代为特征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66页。

② 参见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144-145页。

③ 参见赵明义:“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和当前我们所处何时代问题研究”,《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王昌英:“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研究综述”,《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的历史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研究计划是说明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的转换。^①“观察国际问题,必须要有这样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眼光,才能了解国际事件的时代性质及其发展趋势,才能把握历史发展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时代观理论的基本要义。”^②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对国际体系发展和变革动力的观察,是基于更深刻更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层面的变革,而不仅仅涉及权力、利益、制度、文化等层面。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也是不断发展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都在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增加了新的内涵。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③只有清醒认识世界发展大势,正确把握世界格局的变化,既要看到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又要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才能树立科学的时代观,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秩序观。正如列宁曾指出的:“只有首先分析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④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对生产秩序进行深入剖析,理解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国际秩序的重构,为批判现存国际秩序的局限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新主题,提供了国际秩序重构的时代背景。

二 现存国际秩序的局限性及其批判性分析

现存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随着其构成基础的改变,不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美国战略家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一书中也指出,21世纪的世界秩序结构存在着几个重大缺陷:国家作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正式单元不断受到侵蚀;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缺乏使大国能在重大问题上磋商、合作的有效机制。^⑤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7页。

② 张中云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③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④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⑤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82-485页。

考克斯对世界秩序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借鉴,他从生产活动入手,“因为生产领域的变化能够影响到其他领域,如国家与世界秩序”。他将稳定等同于一种霸权的概念,这种霸权概念把三种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物质权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导性集体概念(包括一定的规范)和一组以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方式治理世界的制度。^①由此形成的世界秩序必然是反映主导性国家的利益的,包含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以及由发达国家掌控的国际制度等等。

(一)生产秩序的不合理造成分配不平等和全球需求不足

考克斯指出,批判理论与新现实主义很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帝国主义的重点研究,在最强大国家间对立的水平维度上,添加了垂直的权力维度。^②“至于生产的社会关系,它表现为企业劳动力市场方式的扩大和外包这种依赖性个体经营形式的复兴。核心和边缘这两个词的含义开始逐渐从地理位置或工业的规模和类型转向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③现在尽管外包制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生产外包向技术密集型的服 务外包发展,但“核心—外围”的国际分工格局仍未改变,作为承包国的发展中国家和作为主要发包国的发达国家在其中的获益远不可同日而语。^④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美国公司离岸外包每支付1美元,可带来1.47美元的收益,其中美国公司获得1.14美元,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承包公司仅得33美分。”^⑤

这种垂直的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不断向外进行生产扩张和地域扩张的结果。“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⑥由此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两种扩张都遭遇了困境,使资本主义体系陷入了危机,由此更加凸显了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的缺失。从长期来看,发达国家既想通过“地域分离”^⑦降低劳动力成本,又想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99-206页。

② [美]同上书,第198页。

③ [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④ 刘海霞:“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与危机——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反思”,《红旗文稿》2012年第11期。

⑤ 甄炳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服务外包”,《求是》2005年第9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⑦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买主扩大资本积累的做法是相互矛盾的,这两个条件很难同时得到满足。^①其一,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使世界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根据2015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就财富分配来看,2014年全球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总数达到1700万户,拥有全球41%的私人财富。与此同时,全球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联合国《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目前在91个发展中国家仍有近15亿人口生活在多维贫困之中。马克思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②这意味着跨国垄断资本及其国际同盟瓜分了世界的财富,大量的处于分化状态中的劳动者则被固定在低收入、低消费水平的一端。不仅发展中国家如此,一直作为全球化受益者的发达国家劳动者,随着福利政策的调整和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不断受到冲击,现在也出现需求不振。有学者通过分析欧洲国家工资政策的变化,指出欧债危机的根源之一,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促使欧洲国家的“团结工资政策”转向“竞争性工资政策”。后者导致工资份额下降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进而引发潜在的需求不足危机亦即剩余价值的实现危机。^③

其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无法在地理上进一步扩张,也制约了核心国家福利的增长。“全世界再分配中所能给予这一体系骨干分子的剩余价值份额达到了极限,再进一步就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④。布罗代尔就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⑤

(二) 霸权国对国际组织的垄断导致国际秩序的不公正

从国际制度层面来看,现有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全球决策机制之外,他们的声音、利益和诉求都被严重忽略。“战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际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作用反映了美国的权力,特别是其特性、观念和经济利益。就权力而言,国际组织是霸权国一个有用的工具,它掩盖霸权的真相。”^⑥金融危机爆发后,现有国际机制应对乏力,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

① 刘海霞:“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与危机——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反思”。

②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2-273页。

③ 刘盾等:“对欧债危机的根源和治理的另一种解读与反思——工资政策转变的视角”,《欧洲研究》2014年第5期。

④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第98-99页。

⑤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页。

⑥ [美]斯蒂芬·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1页。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明显缺失,全球治理单靠发达国家已经是孤掌难鸣了。但发达国家不会自动出让全球领导权和规则制定权。被很多人称为“经济北约”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是依照欧美的利益和价值观来重新制定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谈判,甚至被认为是“美国和欧盟保持世界领导地位的最后一次机会”^①。2016年2月4日正式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视为美国为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而采取的重要举措。这两项协定可看作美欧日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标志,将使发展中国家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难度增大。TPP的一些条款被广泛批评有失公平。比如TPP的国有企业条款主张“竞争中立”,但是这种“竞争中立”却由于“制度非中性”而难以实现公平。“目前的信息表明,TPP的国有企业条款并非‘制度中性’条款,美国要求该条款约束范围限于中央一级的国有企业,省级国有企业不受约束,美国国内没有中央级别的国有企业,因此该国付出的成本为零。可见美国并非希望真正实现竞争中立状态,而是希望以此削弱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竞争力。”^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问题谈判、打击恐怖主义、应对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态度、高度责任感和取得的成就不断获得世界的认可。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中就指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高发展中国家份额和投票权的做法就是变化的最好体现。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机制化,也充分说明发展中国家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已变得空前紧密。

(三)当前一系列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源都与不合理的生产秩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

从国际安全层面来看,大国关系与地区热点相互渗透,非传统安全严重挑战着现存国际秩序。亚太地区的再平衡问题、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难民危机、利比亚问题、阿富汗重建问题、“伊斯兰国”问题等,由于大国的介入和重新搅动,地区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经济与和平协会则指出“9·11”恐怖袭击以来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增加了近5倍。很多极端势力就是被资本主义体系抛弃的人群。2015年11月,伊斯兰国点名全球60个国家是“反伊斯兰国全球盟军”,11月13日法国巴黎市中心遭受“伊斯兰国”的连环恐怖袭击,美国有评论称“这是体制崩裂、防范溃败的一年,这是提醒所有秩序

^① “美欧打造‘经济北约’制衡中俄 外媒:最后机会”,<http://news.sohu.com/20141014/n405094667.shtml>, 2016年3月15日访问。

^② 沈铭辉:“‘竞争中立’视角下的TPP国有企业条款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15年第7期。

^③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3月20日。

可能消失的一年”。^① 这些日益增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使各界不断反思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是文明冲突,还是阶级冲突? 大国利益在其中的渗透起到什么作用? 西方民主输出到底输出了什么? 这对欧洲政治和国际秩序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法国著名左翼哲学家巴迪欧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法国北部城市奥贝维尔埃发表演讲,指出 ISIS 正是资本主义病态主体性的产物,本质上是当代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宗教只是为其提供身份标识和神圣外衣。^②

现存国际秩序的诸多不合理因素与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关系呢? 考克斯充分论证了由物质力量、观念和制度构成的历史结构如何应用于生产组织、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个领域,并指出生产组织中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力量反过来又塑造了国家结构;而普遍化了的国家结构变化又改变了世界秩序的根本问题。^③ 这一过程也就是一国霸权怎样向外扩张成为世界秩序主导力量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一国国内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产生的新社会力量成为一国的统治阶级,然后把其观念整合为普遍化的原则,上升为一系列国际制度,进而塑造了深受主导国影响的国际秩序。“考克斯对现存世界秩序内在矛盾与冲突的分析,实质是对全球化世界秩序中人为不公正性的批判。考克斯把对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的分析最终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一种资本主义霸权的世界秩序最终来自于某个霸权国家的生产方式。这样,他就把对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性直接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④ 考克斯把国际秩序的不合理的根源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而不是只限于分析和辩护现存秩序,比起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显然这种批判理论更为深刻。发达国家极力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主要源于这种国际秩序能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巨额利润,使其保有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但是这种国际秩序的缺陷日益彰显,对其革故鼎新已逐渐成为共识。

三 重拾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推进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面对国际秩序的诸多缺陷,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应对危机,因为这种“问题解决理论”是服务于符合既定秩序的国家、部门或阶级的特殊利益的

① 刘擎:“2015 年西方知识界回顾”,《东方早报》2016 年 1 月 17 日。

② 同上。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 201、204 页。

④ 李滨:“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7 期。

理论。^①那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不应该缺席,更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反映这些新变化、新问题。时代问题、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世界战争与和平、世界经济危机、世界民族和宗教问题等等越来越多的议题被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断被评介和借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当代价值和旺盛生命力。^②在此基础上,如何处理新型大国关系?如何解释伊斯兰等国等恐怖主义的泛滥?如何在生态安全下实现新兴国家的崛起?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国际秩序重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新型南南合作模式究竟是新殖民主义还是新型互利合作典范?如何解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集体安全是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还是采取西方主导的军事同盟?如何应对 TTIP 和 TPP 的挑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界,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国际秩序的变化与转型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是:以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生产组织方式为起点,分析由此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时,正因为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既定的世界秩序以及世界秩序影响下的国家对生产的反作用。简而言之,对国际层面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是围绕具体的生产方式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展开的。^③理论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只有深刻分析现实世界的变化,才能谈及如何重构国际秩序。有学者据此指出,历史上世界秩序结构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同时涉及四个方面的情况:主要国家相对力量的改变;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间生产能力的重新布局;社会内部各社会群体间相对力量的变化和新历史集团的组成;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即新的生产社会关系的建立,以及新的资本积累机制的成立。^④目前这四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多极力量正重塑世界格局。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也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国际秩序进入了转型期。未来世界将向权力分布相对均衡、“去中心化的全球化”方向发展。^⑤

首先,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均衡”,世界权力格局被打破,多个发展中心逐渐形成。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综合实力相对下降,全球战略日益内敛、军事政策不断调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92页。

^② 李慎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展与实践意蕴——王存刚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王存刚:“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路径——考克斯的选择与启示”,《国际论坛》2009年第1期。李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

^③ 李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

^④ [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150页。

^⑤ “专家:未来世界权力将更加分散”,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14/c_11116559804.htm, 2016年3月15日访问。

整,美国能为盟国提供公共产品、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大大削弱,虽然仍可以被称为“一超”,但已经无法再执世界之牛耳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恩·布雷默甚至认为,世界即将进入一个“零国集团”的时代。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杨洁篪在墨西哥答记者问时指出:“多极化进程不仅是指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包括亚非拉等地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性力量的不断增强。”^①

其次,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2014年10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载的经济综述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俄罗斯、中国等“新七国集团”的GDP超越了原有的发达国家“七国集团”。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世界权力与责任的重新分配。

再次,世界权力的转移与分散加速国际秩序失范,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建立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条件。亚投行的成立就可视为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积极补充和完善,这种调整改革,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访美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指出的:“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②

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进行分析可知,正是生产的全球化带来了权力的分散化,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各国实力的不平衡,打破了国际秩序的均衡状态,大国关系、资本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都面临着重构,而且体系的危机反过来也会对国家产生影响,当前经济危机就迫使资本主义进行制度重构。大卫·科兹运用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分析指出,当前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只有通过重大制度重构才会结束。结构性危机标志着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为资本持续带来高利润和为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提供架构的能力的终结。^③

(二) 重视阶级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运用

阶级分析的方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马克思指出,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④ 国际冲突主要源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最大化而造成的多重矛盾。跨国管理者阶级、民族资本家、新自

① 王恬:“世界权力重心‘东移’了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8月4日。

② 新华网北京2015年9月22日电。

③ David M. Kotza, “The Current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 No. 3, 2011.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9页。

由主义推动的产业工人分化,以及和平主义、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与种族/“少数”民族运动等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推动了世界秩序的变革。

国际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逐渐占据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其阶级目标是,追求资本主义全球化并通过建构跨国国家机构和意识形态对全球进行统治。”^①全球化使全球资本比全球劳工具有更大的优势,也使得资强劳弱的局面呈现出新特点。“企业劳动力市场工人被沿着年龄、性别和民族的界限隔离开来,使他们难以团结在一起。”^②并且阶级矛盾与种族、性别的矛盾交错在一起,“少数民族的产生还起到从政治上分化工人阶级的作用,这一事实对雇主是一份政治红利”。^③因此,性别、种族、民族等方面的社会不平等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需要加以重视的,也是扩大其联盟基础所必须要改变的。处于边缘状态的劳动力工作不稳定,无法组织工会,一直没有被纳入工业或政治过程,考克斯称之为“代表性危机”,并提出要建立新的历史集团,就必须先解决这一危机。^④

现在美日主导的 TPP 协定的签署,也对跨国资本做出了有利的规定。协定中“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被指偏袒跨国企业,联合国人权领域的独立专家阿尔弗雷德·德萨亚斯公开发表声明指出,TPP 存在“根本缺陷”,以公众利益为代价,加强投资者、跨国公司和垄断集团的地位,将对劳工标准、粮食保障、健康和环境保护产生负面影响。^⑤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克里斯·希尔顿指出,TPP 协议是仅仅有利于 1% 的富人的单边协议。反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者尤为关注的是,这类诉讼较大部分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国家,而诉讼方多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其中超过八成来自欧美和加拿大,尤其是烟草公司。^⑥所以,只有把当今贸易放在全球生产方式中考察,才能看清全球生产过程中贸易制度作为中介的作用;从谁受益、谁受损、受益多少中,才能认识到当今全球生产关系的本质;从反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中,才能体会到政治的反作用。^⑦

“决定着国家对生产的管理方式的是作为国家基础的阶级结构。社会革命,或阶级结构的剧变,会改变国家在生产中的作用。”^⑧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阶级结构发生

① [美]威廉·罗宾逊、杰里·哈里斯:“正在形成的全球统治阶级: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级”,《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2期。

② [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206页。

③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第12页。

④ [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289页。

⑤ “签字易,生效难,TPP 还得且行且博弈”,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2/05/c_128706195.htm。

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7/28/c_128067252.htm,2016年3月15日访问。

⑦ 李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⑧ [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257页。

了什么样的变化,它们又怎样改变着国内的生产组织,怎样塑造着世界秩序的趋势和走向?无产阶级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新社会运动又扮演怎样的角色?现在的国际秩序是朝着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劳资对立的两极分化方向发展,还是朝其背弃的国家-企业-劳工三方协商机制的方向回归?跨国资本对国家主权有何影响,在塑造国际秩序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未来的发展路径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

(三)建立“中国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是受大国关系变化影响的。”^①目前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的基础不断改变,中国的崛起、融入、参与国际秩序的过程也是重塑国际秩序的过程。那么随着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变化,是否会引发国际关系理论的变革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2015年6月27日出席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时强调,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秦亚青指出,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②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和平式融入、参与式建设世界秩序,可谓形成“中国学派”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鲜活的素材和最生动的注脚。

在目前国际秩序转型之际,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兴大国都在宣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美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还是要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又重申必须保持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欧洲的国际秩序构想主要是想通过促进“有效的多边主义”来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突出欧洲的实力。发展中国家也更加注重抱团取暖,2008年5月16日,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外长会晤时一致认为,当今世界秩序的基础应是国际法治、加强多边主义和发挥联合国的中心作用。

考克斯推测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出现一个新霸权;二是相互冲突的权力中心组成非霸权的世界结构;三是形成反霸权,其基础是第三世界国家结成了反抗核心国的联盟。^③国际新秩序将是众多国际力量既合作又博弈的结果。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的秩序观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秩序观的矛盾之处主要源于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偏见和私利,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之间能够保持和平与稳定,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政治悲剧论”更是认为守成大国与新

^①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②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③ 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20-222页。

兴大国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导致“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更容易导致战争,而含有特别强大的国家,或曰含有潜在霸主的多极体系是众体系中最危险的体系。”^①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基辛格提到哈佛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在历史上曾有的15起守成大国遭遇上升大国事例中,10次引发了战争。^②西方发达国家无视现阶段国际秩序的调整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发生的,而沿袭以往历史上战争和大国冲突充当国际体系变迁重要动力的惯用思维,针对中国提出“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等不实论调,其实质是试图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倡导的很多新理念,奠定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③

一是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理念,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实力有所下降,但它们由安全、生产、金融 and 知识构成的结构性权力在短期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抗衡的。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南北对立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世界愈益两极分化。据世界银行估算,发展中国家增速每放慢一个百分点,就会使贫困人口增加2000万。若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重新调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像德国席勒研究所创始人黑尔佳·策普-拉鲁什所概括的:“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赢战略不仅让每一个参与国从经济上受益,而且是唯一能够超越地缘政治思考的方式。”^④

二是以“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为理念,推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推动力量,并在一系列国际行动中体现了其新的担当:首先,致力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学者指出,其深远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亚非大陆一举从某种附属边缘位置解放出来,使其重新焕发为繁荣和平的新中心地带成为可能,这或将重塑全球新秩序”。^⑤其次,在南南合作中强调打造“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和“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方针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建立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还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都为推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就曾表示:“与欧洲投资者、捐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缓慢、有时带有施恩性质的后殖民主义方式相比,中国满足我们需求的方式

①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 晓岸:“基辛格的地缘政治忧思”,《世界知识》2014年第20期。

③ 刘海霞:“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国际新秩序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0日。

④ “金砖合作 走深走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展望”,《人民日报》2015年7月7日。

⑤ 王健君:“‘一带一路’塑造全球新秩序”,《财经国家周刊》2015年第2期。

更适合。”^①再次,在南北关系中强调建立“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全新的合作模式,成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钥匙。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接受美国《世界邮报》专访时明确指出:“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②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以开创性思维处理国际关系的典范。

三是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理念,推动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面对整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复杂国际安全局势,美日欧依然希望借助军事同盟来解决地区冲突,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安全局势的脆弱性。2015年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第51次年会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就质疑:“国际体系的不稳定究竟是应归因于既有秩序被新崛起力量打破,还是美国扮演的领导角色走向失败?”^③少数发达国家依靠军事同盟垄断国际安全事务的治理模式显然已经难以为继了。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对此明确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④

当今世界处在破旧立新的过渡时期,各种力量相互依存又彼此较量,相互抗衡又竞争合作,使国际局势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一定要看到,时代的发展方向和潮流不会改变,就像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的:“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当今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⑤在这一长期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应担负起更多的理论自觉,思考如何构建有别于现存国际秩序的公平合理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诚如台湾地区学者朱云汉所言:“非西方社会的知识精英必须认真回顾自己的文化脉络,以及从多元文化的视野汲取不同文明历史发展经验的精髓,来试图摸索出超越与替代现存的西方中心观的世界观与世界秩序。建构一种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及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⑥

(作者简介:刘海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英]威廉·沃里斯:“中国与非洲:共建世界新秩序?”,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2月15日。

② “习近平对世界如是说”,《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1月23日。

③ 晓岸:“慕尼黑安全报告拷问国际秩序”,《新产经》2015年第3期。

④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⑤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⑥ 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页。